

美国 新军国主义

安德鲁·巴塞维奇◎著 葛腾飞◎译

国际问题新视野译丛

相蓝欣◎主编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Andrew Bacevich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国 新军国主义

安德鲁·巴塞维奇◎著 葛腾飞◎译

国际问题新视野译丛

相蓝欣◎主编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Andrew Bacevich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By Andrew Bacevich

Copyright © 2005 by Andrew J. Bacevich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本书英文原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2005 年出版。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 - 2006 - 286 号

美国新军国主义

作者简介

安德鲁·巴塞维奇 现为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西点军校毕业，曾任教于西点军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98年到波士顿大学任教。先后发表著作多部，包括《冗长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史》(2007)，《美利坚帝国：美国外交的现实与后果》(2002)等，其文章和评论广见于《威尔逊季刊》、《国家利益》、《外交事务》、《外交政策》等诸多有影响力的杂志和报刊。

国际问题新视野译丛

相蓝欣◎主编

相蓝欣 著名学者

1983年赴美留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获欧洲和北大西洋关系研究硕士、博士学位，在耶鲁大学任国际战略与安全项目奥林博士后研究员。曾任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国会图书馆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现任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曾出版中英文著作多部。中文版《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于2003年12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传统与对外关系》于2007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此外还发表过多篇关于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的文章。成果显著并产生广泛影响。

译丛策划 / 周洁

装帧设计 / 卢晓红

中文版总序

相蓝欣

国际关系究竟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依笔者之见，它注定是一个学术交叉的前沿学科，绝非现行的任何一个单一学科，比如政治学所能包括的。国际关系涉及历史传统、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关系。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必须具备这三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本套书挑选的这批著者正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杰出人才。

象牙塔中研究国际关系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传统史学观点是“究天人之际”，不承认任何普世原则，坚持政治与历史、时间与空间的有机联系。研究国际关系必须为现实服务，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阶段，国际关系研究当然离不开经济问题。在国际经济关系的领域里，很多重大问题是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因为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反映的是大国实力消长的关系。国际政治关系说到底还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中国人强调“政者正也”，将政治关系定位在伦理道德之上。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观不可能将历史与政治截然分开，并创造出让政治单独操作的空间，为所谓的“科学”方法打开大门。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海外扩张和殖民的癖好乃传

统观念使然。张之洞有言,“为国舍理而言势,为人舍势而言理”。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中国人不接受依靠军事经济实力寻求霸权的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幸存的、有长期历史延续的“帝国”。近年来关于帝国研究的兴起不但同美国“一超独强”的后冷战世界格局有关,也是对中国历史地位的恢复的反应。本套书中的奈尔·弗格森的《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是近10年帝国研究的佳作。帝国历史的演变和存在的种种问题对中国刚刚起步的“全球政策”应当有所借鉴,对我们重新思考今后的国际关系体制不无裨益。

关于国际关系的准则问题,冷战后多边机制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特点已经越来越明显。本套书中的里查德·哈斯的《良机: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刻》,是美国政治精英在伊拉克战争后对美国“软实力”急剧下降的一种良性的反思。哈斯曾在小布什第一届政府中担任要职,他的分析不是基于纯学术的思考,而是根据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现实进行立论,对我们了解美国的温和派的思路十分重要。

小布什政府自诩的一个重大创新是用颠覆的手段建立民主。这在历史上其实已有先例。史蒂文·金泽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他对美国的“颠覆”活动做了很有启发的历史总结。至少应当从兼并夏威夷算起的美国颠覆史表明,小布什政府的手段未必比历史上的同类行动高明,而且它也没有吸取很多有益的历史经验。

美国对硬实力的青睐也反应出一种新的军国主义思潮的兴起。安德鲁·巴塞维奇的《美国新军国主义》,是对美国崇尚武力的精神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的一个总结。他指出,“新军国主义”并非是小布什政府的独创,而是在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以及政策制定人当中的根深蒂固的一个理念,其核心是要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这样,美国的“新军国主义”,将21世纪的战争变成了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的“表演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生命不可能是短暂的。

本套书选择了一批有创见的著作,作者中既有曾参与决策的高级官员,也有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着眼点是对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提供较为理性的、历史的分析,我们希望这套书对读者了解西方对这些问题的前沿思路有所帮助。

兹以纪念
乔治·M·布劳
1947—2003
一场拙劣战争中的死者

东方是王公的墓冢
西边芳草青青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
《美国是希望》(1939)

致 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欠了许多人情债。同事、老板、老朋友或新朋友,以及善良的不认识的人,他们都对我尽力相助,难以列举。本书如果有任何价值的话,无疑他们都应该得到一份荣誉,当然书中所有的错误和缺陷都由我本人负责。

我非常感激我的朋友和经纪人约翰·怀特对我的明智建议。他比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更加了解书的商业运作。我要感谢鲍伯·德拉克一开始就力荐我去跟约翰接触。

本书编辑蒂姆·巴特利特,他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出色的编辑,他既给我鼓励,也给我督促,从而使本书做得更好。还有,同在剑桥出版社的,乔林·奥萨卡、玛丽·安·本纳、因迪亚·库珀、萨拉·利奥波德,以及彼得·哈珀也都为本书的最后出版提供了帮助。与这样一个职业团队打交道,我深感荣幸。

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几年来一直支持我的工作,在这里也值得特别提出,在经过几次严重的中途更改后,仍然支持于我。在这方面我要感谢马林·斯特尔梅基和纳迪亚·沙德尔罗的耐心和理解。

波士顿大学给予我整学期的休假,这使我得以按计划完成书稿。我要对系主任杰夫·亨德森,以及对国际关系系允许我休假不用上课表示感谢。我同样还要感谢我的同事鲍伯·杰克逊,他在我离开时代替我担任了国际关系中心的主任。

在这一学期中我因此有了临时的特别待遇,成为柏林美国学会的一名研究员。在其执行主任加里·史密斯博士的带领下,该学会成为非常好的学术机构,为创造性工作提供了理想的环境。我欠加里以及该学会杰出成员们的人情债是难以算清了。

尤其难得的是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和一个学者和艺术家的小团体——他们在那里的时间正好与我一致——共同度过这样一段知性的生活。我同道的这些朋友们真是无穷的激励之源，给予我自由主义的教育体验，而这正是我以前没有得到的。我们一伙人乐在其中。

随着项目接近完成，汤姆·伦普费尔、克里斯·法雷尔以及杰夫·莱昂都自愿地对书稿部分内容发表意见，提供了有价值的真知灼见。我感谢他们。

我的老朋友克里斯托弗·格雷、保罗·迈尔斯以及约翰·理查德森，都是美国政治—军事环境的精明观察家。他们给了我大量的引导与建议，让我保持警觉。

三位坚定勇敢的研究助理，玛格丽特·希基、杰西卡·斯特伦金和乔治·惠特尼，反复地被我折磨，尽管我并没有经常恰当地指导他们。他们是很棒的。

不管在波士顿还是在路上，我的助理简·余都做了许多勤劳的工作，减轻了我许多商业事务的担忧和负担。我深深感激她的辛苦工作。

当我一开始转行从事学术时，理查德·H·科恩就给我鼓励、建议和许多明智的看法。自那以后我便依赖于他，而他从不让我失望。另外，尽管我预料迪克不会同意我的全部结论，但我确实明白他的影响渗透全书。他是一位具有鲜明特点的学者，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集正派与坚毅于一身的人。真是很难以言语来表达我是如何看重与他的友谊的。

最后，我要最为感谢我的妻子——南希，这么多年来一直紧跟着我，风雨与共，总是付出极大的个人牺牲。我希望在这里对她为我以及我的孩子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无尽的感激。我深深地爱她，永远愿意。像一首歌所唱的那样：当我说永远的时候，我意味着永恒。

序 言

这本书的内容是写美国新军国主义的。战争、军人和军事机制上的这种误入歧途的危险观念正遍及美国人的意识,使当今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偏离正轨。

在下面的论证中,在证据的选择和解释中,以及从这些证据得出的结论中,应该要讲清楚的是一整套的推定或趋势。尽管在研究和写作本书时,我力求客观,尽量减少本人的偏见,但所表达的观点不可能脱离作者本人的背景和视野。因此,这一简短的序言包括四个方面的说明:

第一,我是一个越战退伍老兵。正如一位评论家的著名评论所说,美国军队并没有打一场十年之久的战争以保卫南越;然而,它却接连打了十次一年长的战争。我在那场战争令人沮丧的后一阶段中服过一年的役,那是从1970年夏到1971年夏,在越南春节过后,在入侵柬埔寨之后,那时已经是失败的氛围开始笼罩整个战争之后很久了。

我的几个大学同学死在越南。其他的朋友们也都在这场战争中受到身体或心理上的创伤,他们中有不少是我年少时的密友和弟兄们。谨以此书纪念他们。

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完全是令人沮丧的,实质上随着时间的流失感觉更是如此。越南战争提供了参照的框架,在其中我解释了许多其他的东西。这种倾向,很可能有些读者会认为过分。但是,试图隐瞒那些可能是自明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本书代表的即是一种持续的努力的表现,即不断地试图去翻那场战争的历史老账和盘点其遗产。

第二,从越南回来后,我继续在美国陆军服役,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实际上,我的服役时间正好是冷战后半期,这是一段表面上看很单纯的时期,有些人早就把它作为怀旧的对象了。但是,从一个军官的角度看,这是一段犹如过山车的日子。那些在从理查德·尼克松突然中止的总统任期到多事却简短的老乔治·布什总统时期这段时间内服过役的人,没有哪个会认为这是一段稳定或轻松的时光。

然而在军营生活里,却存在着一种绝对明确无误的清晰性。我们每天的例行工作总是孜孜不倦地准备着对所谓“富尔达边界(Fulda Gap)”的防卫,位于西德的该地被认为是任何华约组织进攻的焦点,我们无须再烦自己去考虑目标何在的存在主义问题。实际上,我们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保卫西方,对付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威胁。

这就是目标,它在越南战争后赋予军队独特的味道。即使当这个国家似乎不在乎——在那段时期的大多数时间显然是没有在意——我们在牵制苏联因此使自由得以维护。但至少我们是这样相信的,并且怀着毫不动摇的信念。

正是这——不是征服、政权变换、预防性战争,或者帝国统治——我们理解成美国军人真正的、光荣的使命。这一有关军人目标的老的理解——现在或许变得过时了——同样传给了大多数的后来者。

第三点涉及政治。而对于政治,我是一个迟到者。尽管围绕越南战争的推诿和公开的谎言已使美国军人的道德水平极为糟糕,但还是有足够的道德水准得以延续,大多数年轻军官在那场战争之后还是能懂得,当涉及政治的时候,他们不要参与其中。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现役军人的日子便意味着远离政治。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参加投票,但我们这样做,更少是一种党派关系的表达,而更多是从公民义务的

角度。

只有当离开军队后,这时早已进入中年了,我才开始提高我的政治自觉性。而那些跟我同出生在婴儿潮时代的人在以前冲动的年轻时代便已经经历过这一阶段了。就像任何别的事情一样,作为对内心宗教信仰的响应,我自认为是保守派。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开始定期给一些被界定为政治右翼方面的杂志撰写稿件,包括《旗帜周刊》、《国民评论》、《第一要务》。

只要我们共同谴责克林顿时期的愚蠢和虚伪,我与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关系保持着相互一致。但是,即使在 2000 年那场有争议的选举作出最后决议之前,很清楚——至少在我看来,保守派容易受到他们自己贴给人家的这张愚蠢和虚伪标签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关头,我与保守派文学机构的关系开始紧张,不久最终瓦解。

现在,我在文化上仍然将自己放在右派的位置。我继续质疑主流自由主义所提供的药方。但是我对所谓的主流保守主义——以当今布什政府及其追随者为具体体现——也不再抱有幻想,这也几乎是绝对的。财政上的不负责任、强盗式的对外政策、对宪法的漠视、在深刻的道德争论中仅仅是嘴上说得好听:所有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保守派价值观。

对于这些情况,我的观点已经与激进左派长期以来的批评一致了:正是主流界自身,既包括专职自由派,也包括专职保守派,使得出现了这些问题。两党控制了国家政治,并且就像事先约定似的,使国家政治变得琐屑浅薄了。每一方都在对其核心成员糟糕的才能极尽谄媚,每一方都像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迷恋于权力。历史学家沃尔特·卡普对 20 世纪初政治的尖刻评论让我印象深刻,这话也同样适用于 21 世纪初:“在党派偏见的喧嚣后面,两党的领导人却在一起工作,狼狈为奸。”¹ 共和党和民主党可能不会一样,但是他们制造了近乎相同的结果。金钱买来门路和影响,富人和名人得到服务,而无钱无名的人只是受到压榨——这是与军国主义在美国兴起很有关系的一些事实。

我毫不怀疑,如果缺了有声望的男人女人,世界政治将不存在。但这制度本身已彻底堕落了,已经与真正的民主精神不相容了。对这一点,每个人,只要有眼睛能看,

他都会承认。

因此,接下来的内容带着准确无误的保守派标记,特别是将重大的意义——可能是特别重大的意义——赋予 20 世纪 60 年代这方面。在虔诚的右翼分子看来,这个 60 年代是一个令当代美国苦恼的所有邪恶的发生地。但是,接下来的内容也是这样一种记述,它表明,在那些占据公众视线并冒充保守派的人当中,有许多人也同样对那种苦恼,对他们自身表现出来的尤其明显的美国政策的过分军事化有责任。

有人会将这错误地理解成讥讽的言辞。实际上这里说得确确实实。

最后一点涉及我对历史的理解。在进入到以讲授和写作关于当代美国对外政策为中心的职业生涯之前,我是作为一名外交史学者接受培训的。我的研究生学校的导师们是一些具有很高声望和才识的学者们,在每个方面都令人敬佩。他们同样是极好的老师,我离开研究生学校后就深受他们的影响。我自己对严肃的历史学问的初浅尝试也留下了他们治学方法的印记,曾给予将军、总统、内阁大臣们这些重要人物以历史首要推动者的地位。

现在我认识到那一观点的错误。当研究像威尔逊或罗斯福这类总统时,那些看起来似乎是完全合理的内容,一当布什或克林顿位居椭圆形办公室时便完全失效了。现今总统地位被神化的趋势——他的每个行动都被记录,每句话都得到仔细分析,每个决定都被仔细观察以发现内藏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公然违背了共和国的准则,同样暴露了对世界如何运转的一种根本的误解。

这个世界上最强者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他手中行使的权力,而是他以及他的代理官员们是如何被他们不能掌握、也许他们都不能理解的力量所制约的情况。不是使历史屈从于他们的意志,总统们以及他们周围的那些人更可能是按照历史的节奏来跳舞。只有那些公共关系成员们中大量产生的、又经歌功颂德的新闻记者们记载传扬的那些假象,才能使我们看不清楚那些位居西侧厅 (West Wing) 内室的人是代理人而不是独立的行为者。尽管作为一个人,他们可能会是引起关注的,但很少人应该得到高于最低限度的历史重要性。所以,当接下来讨论不同的人物时——不

仅仅政治家,还有军人、知识分子以及宗教领导人,是把他们用作一种工具,以突出正在进行中的一个更大的过程。

当考虑补救行动时,重视人的力量的局限性就特别必要。如果问题超过了某个特定的总统或某届政府——就像我所相信的美国军国主义的问题那样——那仅仅让哪个总统下台不会使这个问题消失。假装解决问题只能是无济于事。

在这些有关美国新军国主义及其起源的分析中,我绝不宣称已经穷尽了事实的真相。本书不可能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最后的言论。我期待,一些读者会把这里提供的调查结果更多地当成一种启发性的,而不是结论性的。当然,可能有在越南服役的某些人的经历没有收集进来以构成本书有关经历的内容;或者某些人并不具有我自己这种天主教保守主义倾向,这都很可能导致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解释。对美国政治和历史的不同意识形态倾向或观点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补救方法。

了解了所有这些之后,以及在给美国人关于战争、军队和军人的思考恢复良知和现实主义态度的共同事业过程中,请不吝提出各种纠正和修正的建议。

导 论

在美国的历史上,今天的美国人前所未有地被军事力量迷惑了。美国现在所拥有的全球军事霸主地位——美国人正要专心使之永久化——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特性的核心。不仅仅美国无以匹敌的富足资源,或甚至是其大众文化的传播,还有这个国家的高技术武器库以及使用这些武器的军人都在表明,我们是谁,我们代表什么。

一谈到战争,美国人就使自己相信,美国拥有特殊的天赋。2003年春,记者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注意到,“美国军事优势的程度已经达到几乎不可能再大的地步了”。在“伊拉克自由”行动当中,美国军队已经超越了怀疑的阴影,表明他们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强大军队……比1940年时的德国国防军强大,也比罗马帝国权力顶峰时期的古罗马军团强大”。其他国家“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没有赶上的机会了”。¹评论员马克斯·布特对于与二战中德国军队的比较结果轻蔑地说道,这是到目前为止“军事行动卓越性的黄金标准”。在伊拉克,美军的表现已经使得“神话似的将军们,像艾尔温·隆美尔和海因斯·古德里安等比较起来都肯定逊色多了”。²伊斯特布鲁克和布特在中心意思上观点一样:在现代战